

王朝兴衰与沙砾人生

2022/04/06

自秦始皇统一天下，其后西汉短暂恢复分封制，中国由封建主义进入大一统帝国主义，王朝兴衰更替两千余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大一统王朝的兴衰大体经历以下四个时期：开国之初，对内平乱、对外作战，清洗旧贵族，重整朝纲，百废待兴；之后几十年，经济发展，人口恢复，财富积累的同时，贫富差距扩大，土地兼并严重，由于生产力有限，人均资源紧张，社会矛盾加剧；接下来，对内改革，对外作战，成功则迎来短暂中兴，失败则加剧衰落；最后进入衰退期，从皇帝到官员普遍怠政，腐败盛行，财政严重亏空，朝纲崩坏，王朝名存实亡。大厦将倾之际，往往内忧外患：内部遭遇自然灾害，饥民流离失所，揭竿而起；外族势力虎视眈眈，养精蓄锐，伺机征服中原。

1947年毛泽东带领农民军进入京城之前和黄炎培有过一次著名的“历史周期律”的谈话。毛当时自信地声称民主之路是中国跳出历史周期律的秘诀。很可惜，新政权建立后民主很快被抛诸脑后。民主会让人民不满意的政府下台，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哪个政权自我革命且成功的。有着伟大爱国情操的光绪皇帝愿意为了国家放弃皇权专制，却也拗不过周围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短暂的国民政权命途多舛，1928年东北易帜，几乎要完成大一统，不久便遭遇中国历史上最惨烈、最严重的外族入境。作为一个打着“民主共和”旗号、由一群民族主义精英把持的新型王朝政权，不仅内部行政腐败，也没有意愿和能力改革这个农业大国积弊已久的社会经济结构，注定了它无法对抗一个在抗战中壮大、积极开展土地革命的农民政权。

新政权诞生七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进入二百年多年来最繁荣富强的时代。1992年后国家高速发展的核心，是通过构建市场经济体系，将巨量低成本劳动力投入出口导向型生产活动中。所谓人口红利，是无数中国人在低薪资、低人权、高通胀、高压力的就业环境下，通过融入经济全球化大潮，为国家积累原始资本。而房地产作为收集民众劳动剩余的工具，直接给政府提供巨量资金。人民劳动产出的资金被投入到军事、教育、科技、医疗、基建、民生等诸多部门，这一过程中尽管伴随严重腐败和內耗，生产力和综合国力仍然显著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改善。但是，和历史上所有处于上升期的兴盛王朝一样，繁荣表象下各种暗流涌动。土地兼并和苛捐杂税改头换面，本质却丝毫没有改变。高昂房价的溢出部分，对普通人来说是“进城税”，对国家而言则是“发展税”。房地产将普通民众的所有积蓄并和未来几十年的收入转移到政府手里，当劳动剩余被榨干，房地产泡沫就达到了顶峰。与此同时，官僚和新贵集团囤积大量房产，城市底层买不起房，正好对应古代的土地兼并；自耕农被迫成为佃

户，放在当下就是辛苦交房租、还房贷的打工人。城乡发展不平衡和地区间发展的巨大差异，进一步扩大了贫富差距。但是新王朝吸取历史教训，通过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制并冻结私人土地流转交易，保住了广大农民的基本盘。只要农民有土地、不交农业税，无论国内政治经济如何动荡、国际形式如何变幻，农民就有活路，就不会造反。这是本朝区别于所有古代王朝的一大特点。未来活得最辛苦的将是城市底层无产者，而他们将代替农民成为引发社会动荡的最大风险因素。

另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人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和平时期出生人口持续暴跌。人口红利消失殆尽后，如果不能实现产业升级，生产有更高附加值的产品，新一代受过教育、高成本的年轻人既回不到农村、也不愿进工厂，将面临严重失业，无法创造前辈那样多的财富，国家财政就会出现危机。

高通胀、高失业率和贫富差距是造成财政危机和社会动荡的“三高”，从古至今葬送了无数政权（参见“阿拉伯之春”）。在财政危机和社会动荡下，专制体制由于没有政府改选机制，且高压之下民众发声困难，政府缺乏对社会舆情的准确把控，就像高压锅没有泄压阀也没有压力计，锅里越是沸腾，只知道把封条压得越紧。在古代，底层豪杰还能揭竿而起，现代威权/专制政权只要统治集团不解体、军队不动摇、无强大外敌入侵，底层有口饭吃，国内革命几乎不可能实现。在国际人员流通仍然可能的情况下，一部分有能力的社会成员会加速逃离。因为当人治威权国家遭遇危机时，规则极易受到破坏，除了危机本身对人的不良影响，各项基本权利和固有利益都会受到威胁，需要趁着人身自由尚存时规避风险。这次疫情暴露出的地方权力的专断、对人权的漠视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当下疫情的问题不是选择何种路线——这一点对官方而言毫无悬念——而是清零政策能否像之前那样成功应对 $R_0=9$ 的新变种。防疫的最终和最高目的不是“人民生命健康”，因为坚持这样的防疫政策将成为一场慢性屠杀。防疫的最高目的是保证政权荣誉、社会稳定和权力平稳交接运行。中国在 Omicron 变种出现前相对西方国家的有效防疫成为“道路自信”的重要背书和宣传资本。一旦选择开放共存，之前抗疫成功积累的全部政治果实不仅是付诸东流，而是直接加上一个负号，这对厌恶风险型的威权政府来说是万万无法接受的。民主国家的政府执行力和渗透力远不如威权政体，它们干脆冒险摆烂，大不了下台；而威权国家必须对全体民众负责，下台意味着巨大政治动荡。至于经济危机、民众生活困难与怨怒，则是小得多的风险，更何况，还有相当多的人支持动态清零。民众的记忆是很容易被改写的，若能克服本轮上海疫情，群众的怨怒与悲伤将会很快被遗忘，被官方塑造的“共克时艰、祖国万岁”的集体记忆所替代，正如两年前对武汉疫情的记忆一样。中国的底层民众往往无能、懦弱、被愚弄，于是在危机到来时，他们的利益会首先被牺牲，且掀不起多大波澜。然而倘若社会的仁爱 and 正义彻底沦陷，每个成员都有可能成为被牺

牲者，同时还要面临少数绝望的底层反抗者自杀式报复的风险。对于中国未来防疫政策的另一个猜想是：宣传上坚持动态清零，实际上选择与新冠共存，前者赢了面子，后者赢了里子。至于如何将矛盾的做法整合到一起，鉴于本朝过去三十年打左灯向右转，将矛盾统一法运用得炉火纯青，他们只要想做完全可以做到。

尽管危机重重，两千年的治乱循环的大一统历史表明，只要底层民众尚能维持基本生存，统治集团重要成员利益不受侵害以及军队保持强大忠诚，政权就不会轻易倒台。政府还可以塑造并夸大境外势力转移矛盾、制造可控国际争端发泄情绪，缓和国内危机；甚至选择对外冒险，一旦获得成功，可以大大延缓衰落进程。然而历史证明，对外转移矛盾往往只会加速衰亡。改朝换代并不是一件悲观绝望的事情，仅仅意味着一个新的周期即将开始。动荡期一般短暂，一部分人悲惨死去，另一部分人逆天改命。对于个体而言，历史周期律最痛苦绝望的阶段是衰落期，漫长而无力，底层人民生活朝不保夕，卑贱地苟活着。

上文提到在本朝，引发动乱风险的主力军将从农民变成城市无产者，除此之外，本朝显著区别于古代王朝的另一大特点是政府对民众的思想控制达到空前高度。随着大众教育的普及、互联网传媒的兴起与无孔不入的渗透，爱国主义宣传深入人心。崇尚秩序与等级的儒家思想是古代王朝的统治工具与法理来源，而本朝则通过构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宏大叙事体系，塑造爱国主义集体共识，将所有社会成员与利益群体纳入其中。正如民主自由之于西方世界，《古兰经》之于伊斯兰世界，爱国主义是中国社会的“第一原理”，不接受任何质疑。爱国主义在帝国政府手中具有吗啡和安他非命的双重效果：镇痛和兴奋。当民众对政府不满意时，爱国主义可以阵痛，平息情绪，如果再塑造一个外敌，转移矛盾，就可以疏导不满。爱国主义还可以使人兴奋，肾上腺素分泌加剧，一旦与物质主义结合，对于一个产品附加值不高的制造业大国，有利于维持高压生产秩序、提高生产率，保持军队团结和战斗力。爱国不等同于爱国主义。爱国是一种思想情感，爱国主义是意识形态。爱国不等同于爱政权爱政府，但帝国政府必须把民族国家和政权绑定，教导人民“朝廷即国家”。宣扬爱国主义的人不一定真的爱国，爱国人士也不一定是爱国主义者。而打着爱国旗号肆意打压异见者，实为国贼。

镇痛剂和兴奋剂容易成瘾，如果发现自身问题不去解决，懒惰、愚蠢而懦弱地一味打针，身体只会越来越虚，抗药性越来越强，直到某天遇到一系列大问题，发现打针没用了，大家不再相信爱国主义的精神抚慰。受过教育的普通民众犹如墙头草，会很快改变想法，要求立马解决问题，不然就解决政府，那就是瘾君子政权大厦将倾的

时刻。轻则社会动荡、政府重组、修宪改体，如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重则陷入内战，民不聊生。

历史周期下的王朝兴衰，短则人的一生，长则三四百年。只要逃不出这个王朝周期律，兴衰之后二百年，又会有一个王朝跳出来，想要恢复当年的伟大荣耀。精通中国历史的毛泽东说民主是解药，我很赞同，可惜中国的史书上完全没有民主方案。至于未来能否走向民主政体则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甚至民主本身的命运在二十一世纪都面临巨大危机。本朝气数远远未尽，就算改朝换代，新朝面目也大不可知。未来如果能够通过政治改革完成朝代更替和利益重新分配，避免流血暴动乃至全面内战，已经算是中华民族之进步与万幸了。

爱国主义和物质主义是当今中国人的两大精神支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是粉饰门面的装点物。生活在这样一个古典文明毁丧、文化断层的国家，一旦离开了官方宣扬的宏大叙事，脱离了拜金主义的社会主流，个体该如何构建自身存在的意义和目的？这沙砾般的人生在时代浪涛中该何去何从？这巨大的精神危机，亦是笼罩在当代中国上空不散的乌云。而这，比起政权稳固、经济发展、收复台湾，显然不是政府在乎的——甚至是他们有意无意一手造成的。

